

译介之旅

我的翻译之路

□吴岳添



吴岳添, 19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法语专业, 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国文学专业, 文学硕士。1986-1987年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进修文学社会学。曾任社科院外文所科研处处长和南欧拉美研究室主任, 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现为外文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作协会员,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出版著作近百种, 主要有专著《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左拉学术史研究》等, 文集《远眺巴黎》《塞纳河畔》等, 译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苔依丝》《小爱美德》《悠悠岁月》等, 主编《法国经典戏剧全集》《左拉研究文集》《马丁·杜加尔研究》等。

我的第一部译作是法国理论家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三套丛书”的主编陈焱先生约我翻译的这部理论著作, 奠定了我从事翻译事业的基础。首先是它在80年代译介国外文坛的热潮中影响很大, 后来多次再版, 直到2019年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了《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其次是1985年12月, 法国使馆文化专员来社科院面试, 我因此有了去法国进修的机会, 却苦于没有路费。陈焱先生获悉后, 主动将翻译《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稿费预支400元, 使我得以乘坐火车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文学社会学班进修, 而我到巴黎后就立即去拜访了加洛蒂先生。

在进修期间, 导师雅克·莱纳特选定的教材, 是当年刚刚出版的奥地利学者齐马的《社会学批评指南》。在社会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中, 这是一部承前启后、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 所以我在1987年回国后把它译成了中文, 并且把陈焱先生列入的“三套丛书”, 为了利于普及把书名改为《社会学批评概论》, 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21年11月, 出版社增订再版时改成了《文学社会学批评》。

1985年夏天, 法国出版商布古瓦夫妇等一行访问我国, 由我陪同翻译。在机场送别的时候, 他把途中阅读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的名著《中国古代的性生活》送给我。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名著, 其中有高罗佩担任驻日大使时收集的我国已失传的文献。我在1988年应出版社之约开始翻译, 在没有电脑和复印等技术手段的情况下, 费时一年多在图书馆手抄文献, 终于在1989年5月完成了译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出版受阻, 又是陈焱先生仗义执言, 为我书面证明该书不是色情读物而是学

术著作, 但最终仍未被批准发表, 后来是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先生带到台湾去出版的。《中国古代的性生活》是汉民族的性学史。“性生活”并非单纯的性行为, 而是指包括宗教教义、家庭结构、陈设服饰和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广泛的社会生活, 1994年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考虑到“性生活”一词可能引起的误解, 我向准备再版此书的出版社建议改名为《中国古代的性文化》, 以便于我国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翻译是相当艰辛的工作。一本书就是一门学问, 要翻译就必须熟悉该书所属的学科。例如翻译《文学社会学批评》, 需要了解西方的文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过程; 翻译《古埃及探秘》和《亚历山大大帝》, 就要熟悉古代的世界史等等, 总之译者应该是通晓百科的“杂家”, 为此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 同时要与时俱进。例如在改革开放早期的文论翻译中, texte 一词有两种译法: “本文”和“文本”。我在《社会学批评概论》中使用的是“本文”。后来“文本”逐渐成为译界的共识, 我也就随善如流, 在新版的《文学社会学批评》中改成了“文本”。

毋庸讳言, 初学翻译的人必然会出错, 我也有过深刻的教训。90年代初我翻译《左拉文学书简》, 第一封信是左拉写给中学里的同学 Paul Cézanne 的, 我以为书信不是小说, 容易翻译, 中学同学叫什么名字也无所谓, 于是随手就按照拼音译成了保尔·塞扎纳。全书难度不大, 很快译完, 出版后才发现这个同学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塞尚。我后悔莫及却无法更改, 只能怨自己孤陋寡闻。从此翻译时如履薄冰, 碰到人名地名绝不含糊。例如萨特的女伴西蒙娜·德·波伏瓦, 往往因为是女性而被译成“波伏

娃”。其实欧美的人名是名在前, 姓在后, 西蒙娜

是亲友们称呼她的名字, 波伏瓦是她家族的姓氏, 正式称呼应该是波伏瓦, 正如让-保尔·萨特被人们称为萨特一样。

人名地名通常按照拼音翻译, 但是约定俗成的译名应该沿用。例如大仲马和小仲马, 不能按照原文译成仲马父亲和仲马儿子。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 显然胜过原名《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这两个巨人父子的名字。这就涉及译界前辈严复提出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和傅雷的“神似”说。“信”是要求翻译忠实于原著, “神似”则重在传达原著的神韵。实际上“忠实”与“神似”并不矛盾, 要靠译者自己体会和把握。例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高里奥老爹》, 傅雷按照国人的习惯译成《高老头》, 堪称神来之笔。雨果的名著《苦难的人们》被译成《悲惨世界》, 更是气势磅礴、意境高远。

文学翻译是翻译基础上的再创作, 对译者有着更高的要求。2009年, 我翻译安妮·埃尔诺的小说《Les Années》, 原文的意思是《年代》, 内容是回忆她从小到老的60多年的成长过程, 是人们共有的经历来反映时代的演变。Les Années 在法语中意味着年复一年, 而汉语的“年代”是指一个时期。译成《年代》或《时期》并无不当, 然而只有《悠悠岁月》才给人以岁月流逝的沧桑之感。小说中有埃尔诺精心选择的、大量具有时代特色的名词, 例如歌星影星、时尚商品、电视节目、小说人物和粗俗俚语, 其中有许多没有中文译名, 若非亲历其境将会不知所云, 所以我向熟悉社会变迁的法国友人请教, 了解清楚之后加上了适当的注释。

我的母语是中文, 所以与法译中相比, 中译法的难度要更大一些。2022年, 德国格兰兹出版社约请我把中文小说《我是北京地老鼠》译成法文。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许多被称为“北漂”的青年男女涌进首都北京, 小说描写的就是其中一些人在这个大都市里的艰难生活。小说运用了许多北京的土话, 例如“爱谁谁吧”, 这在词典里是查不到对应的法语词汇的。因此除了反复琢磨推敲之外, 必要时也要请法国友人把关。

我从事笔译45年, 译作近40种, 它们不可能尽善尽美, 错讹之处在所难免, 但是不会有不负责任的硬伤。我对翻译的粗浅体会有两点: 一是翻译时要充分理解原著, 在不改变原作风格的前提下, 尽量传达原著的神韵; 二是译文一定要通达流畅, 如果读者难以看懂, 必定是译者的一知半解和翻译得词不达意造成的。人生苦短, 译海无涯, 唯有活到老学到老, 努力向前。

译文

在讲述到的从前的时代里, 只有战争和饥饿。

结束时他们唱起了《啊, 本地产的白葡萄酒》和《巴黎之花》, 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中, 他们吼叫着副歌的词语, 蓝—白—红是祖国的色彩。他们伸出手臂笑着, 再唱一首德国人不会有的歌曲。

孩子们没有听讲, 一旦得到允许就急忙离开餐桌, 利用节日期间普遍的宽容去做禁止的游戏, 跳到床上头朝下打秋千。但是他们记住了一切。与这个神奇的时代——他们不会马上去整理它所有的插曲: 溃退, 逃难, 占领时期, 登陆, 胜利——相比, 他们觉得自己成长的这个无名时代平庸乏味。当必须像波希米亚人那样成群地上路和睡在稻草上的时候, 他们惋惜自己当时没有、或者刚刚出生。他们对这个没有经历过的时代念念不忘。别人的回忆使他们对这个只差一点没赶上、希望有朝一日能经历的时代暗暗地产生了一种怀旧之情。

这一连串闪光的英雄事迹剩下的只是无声的灰色遗迹: 悬崖当中的碉堡, 城市里望不到边的石头堆。一些生锈的器具, 用扭曲地突出在瓦砾上的废铁做的床架。受灾的商人在废墟上临时搭成的木棚里安顿下来。被清理出来后丢弃的炸弹在用来玩耍的男孩肚子上爆炸。报纸上刊登通知, “不要碰弹药!” 医生从孩子们的喉咙里取出细嫩的扁桃腺, 他们从乙醚的麻醉中吼叫着苏醒过来, 于是就迫使他们喝滚烫的牛奶。在一些褪色的广告牌上, 占据着大部分画面的戴高乐将军在军帽下面远远地注视着。星期天下午我们玩着小马和猫的游戏。

解放之初的狂热逐渐冷却下来。当时人们只想出门, 而世界上也充满了可以立刻满足的欲望。凡是称得上战后第一次出现的东西都使人趋之若鹜: 香蕉, 国营彩票机构的彩票, 烟火。从女人们扶着的祖母到童车里的婴儿, 人们都是全区出动, 扑向集市日、火炬游行、差点被挤倒践踏的布里尼奥纳马戏团。他们在路上形成了祈祷和歌唱的人群, 去迎接布洛涅圣母院的雕像, 第二天再送出去若干公里。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所有能让他们一起外出的机会都是好的, 似乎他们乐意继续过集体生活一样。星期天晚上, 卡车带着许多身穿短裤、爬到行李上面唱得震耳欲聋的年轻人从海边回来, 狗自由地跑来跑去, 在街道当中交尾。

这个时代本身开始被作为美化了的日子来回忆, 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我想起美丽的星期天……》这一切确实多么遥远! 时就感到失落。这一次孩子们遗憾的是自己在经历解放这个时期的时候太小, 还没有真正的体验。

——节选自安妮·埃尔诺《悠悠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岳添译)

天涯异草

“画家村”, 巴比松森林的呼唤

□沈大力



莫特枫丹的回忆

比奇奇特画家、西班牙血统的纳索斯·迪雅兹, 他受普律东性格感染, 感怀伤遇, 抒哀怨逸气。然而, 到巴比松隐居, 他以画家会友, 如鱼得水, 似乎找到了一个闲适宁静的港湾, 他曾颇有兴致地坦腹: “我们都是艺术家, 皆在有幻想的年龄。我设想, 今后的青年倘若进入这片森林, 或许会恒久听到可凭之追忆我们的笑声。”迪雅兹已离世多年, 但他当年在巴比松住过的木屋至今犹存, 围绕在乡野藤蔓丛中。

现今, 远方的游客可以参观“巴比松画家博物馆”。该馆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原先自1820年至1860年柯罗、米耶和迪雅兹等多人投宿的卡纳旅店。陆续来此汲取大自然灵感的画家中还有查理·多波尼(Charles Daubigny, 1817-1878), 曾师从德拉纳罗什, 1835年从罗马归来, 到巴比松绘画, 经日静坐林地, 以细腻笔触润了巴比松派的画风, 起到一种“氛围效应”, 还为欧仁·苏的社会长河小说《巴黎的秘密》插图。尚需提及茹尔·杜普莱(Jules Dupré, 1811-1889), 他先跟英国的风景画家交往, 认识鲁索后, 于1846年到巴比松栖身, 加入了“卡纳画家帮”, 同样凸显厚涂纯朴大自然的《大橡树》和《船闸》等精品。他的同伴查尔斯·特瓦雅(Constant Troyon, 1810-1865)画行造语精深, 以在枫丹白露露事怡然为乐, 尤臻于画奶牛, 其动画《在池沼饮水的奶牛》意趣昂然, 秀气可掬, 现存卢浮宫。巴比松可说名草辈出, 秀出群芳。有杰出风景画家申特伊, 也颇有声艺坛。

美术爱好者特别会追忆起的鲁索和浪漫派诗歌插图的石板印墨画家塞莱斯特·南特伊(1813-1873), 以及油画家路易-戈德弗瓦·雅丹(1805-1882)等人均笔迹劲爽, 善用云水飞动呈现出诗情画意的境界。鲁索的画坊构成巴比松博物馆的第二部分: 鲁氏在其中度过了一生最后的20个春秋, 他和一批巴比松画家的家具和日常用品以及装饰, 甚有意态的画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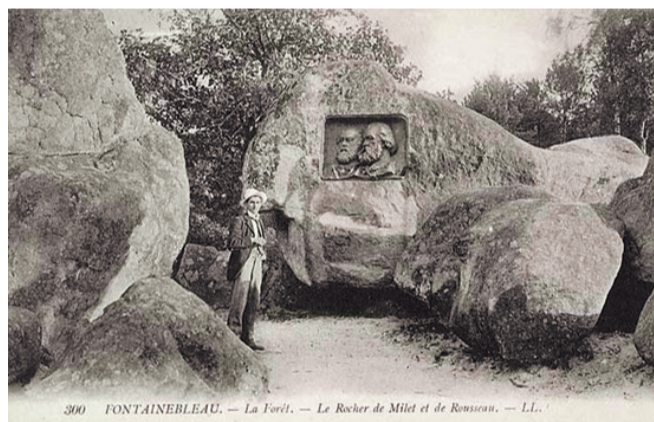


为游客设置的“画家之路”路标

尤其是集体制作的木质壁画, 现今依然陈列如昔, 再显画家们往日生活场景的流风余韵。

巴比松派风景画家已经逝去几十余载。他们曾在年轻时受卢梭启蒙哲学的启示“回归自然”, 避世隐居林野。在大森林的感召下, 众人聚集乡野写生, 不受形格势禁, 彻底突破了欧洲传统画坛的成规。一个个都将画板放置于大自然怀抱, 信手挥洒, 临画草木, 用彩笔绘出一年四季变化无穷的神奇景致, 乃至农家淳朴的田园生活, 臻入化境, 开辟了艺术的新境界。他们崇尚创作自由, 放眼无穷的宇宙, 在天天地间畅想, 尽情抒发情怀, 逐步向印象派发展。柯罗有名言: “永远不要忽视触动你们的最初印象。”鲁索也强调画家对景求趣造意, 总是处在“感觉的尖端”, 要竭力保存“世界意识的顷刻”。可以说, 巴比松派画家们将绘画题材重点从都会庭园扩大到流云飘岗的乡村, 改变绘画,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绘画艺术的审美范围, 此乃美术界一大进步。作为“经院传统”的叛逆, 该派确是启马奈和莫奈“印象派”的先河。不过, 他们在艺术上探索新机理, 却受到相当历史环境局限, 远非传之无涯。诚如大诗人歌德所云: “人们呀, 你们何时能理会, 高尚高于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之中。”依此, 以柯罗为代表的巴比松画派曾经为开拓艺术创作之路奋力, 给后世留下宝贵精神遗产, 为画史所传颂。

巴比松森林依傍着法国最美森林之一“枫丹白露”, 闻名全球的“画家村”至今四季回荡着森林的呼唤。像过去召引柯罗、米耶和鲁索等一批画家那样, 依然吸引着当代厌烦大都会喧嚣、渴望回归自然的人们。只是, 与以往不同, 休闲娱乐特别是旅游的色彩更为浓厚, 世界各国无数好奇的游客, 纷纷不远万里而来。值得注意的是, 游人中不少来自中国, 表明东方人对“巴比松画派”的故乡怀着浓厚的兴趣。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审视, 中国的山水画与巴比松派的自然风景颇有相同之点, 皆心有灵犀, 透过



米耶与鲁索纪念石雕像



拾麦穗农妇

现实的“魔镜”, 流溢于艺术真谛,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巴比松位于彼埃尔平原, 在默伦公路约13里处, 离枫丹白露森林仅800米。村里与一般法国农村不同, 并没有广场, 教堂也是由原来一座谷仓改造而成的。村中称为“大街”的, 只是一条狭窄的卵石“干道”, 与数条巷陌垂直相连。周围房屋绿树掩映, 间隔着一些画廊和商店, 一切都再寻常简古不过。随着时代变迁, 自20世纪初叶起, 一些艺人陆续在巴比松村置产, 作为第二住宅度假。他们中间有工艺美术家夏洛特·于盖及其夫婿埃·施密特-菲奥里夫妻俩。男方精于细木工艺, 于2013年办起了“无花果树与猫头鹰巢”作坊, 建造木屋, 施展才能。在他们之后, 特别是2015年1月《查理周刊》遭恐怖袭击, 巴黎市内人心惶惶, 第二区的居民纷纷逃离首都, 移居到巴比松。一些文化和演艺界人士接踵而来, 这批“新居民”大大改变了该地住户的成分。

旅游业在巴比松逐渐兴起, 接待远方来的探访者, 宛如绘画艺术的“朝圣”, 颇像位于吉维尼莫奈的“日本花园”。而且, 这里成了从巴黎至雅各塔居, 经法国西北方厄尔省的夏特勒圣母院, 去西班牙境内的贡波斯特朝圣者的必经之路。村里为此设置了路标牌, 途经的朝拜者人人背包上都带有可识别的扇贝壳标志。面对这种现象, 巴比松村村长吉拉尔·塔波纳见证道: “现今, 我们这里接待来人, 呈‘舒缓旅游业景象’。与过去靠乡野、大自然吸引人, 已大为不同。”